

百年文潮丛书

百年

自由守望

z i y o u s h o u w a n g

胡适派
文人引论

潮流

沈卫威
著

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袁银昌

自由守望

——胡适派文人引论

沈卫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875 插页3 字数275,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646-8 / 1 · 1338 定价：19.00元



在时下这个可以言说的语境里，
以自己相对个体化的语词，客观追述了
胡适及其自由主义同人的议政操行的基本过程，在大众话语的可适时兼容中，
演绎、批判其自由主义思想。
还有不可言说与不必言说的。

沈卫威

作者手迹

自序

面对着发黄、发霉的《新青年》、《新潮》、《新月》、《观察》，独自翻览，似在触摸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跳动的脉搏——怎一个“新”字了得。我感到自己的心和他们一起在搏动。在寻找胡适及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行踪及心智历程时，我从不同的角度为胡适写下了三本传记、三本读书札记。^① 在这个读写的过程中，除了少有的自娱外，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忧痛。这个民族告别传统走向现代是如此的艰难，作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胡适派文人被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所反对；作为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们被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不容。于是我的著述中有了“无地自由”这一基本的主题。

胡适及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是我关注的一个侧面。从中我发现了他们的痛苦、矛盾，以及文化心态、人格上的复杂性、丰富性。揭示这种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演绎

^① 一、《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二、《文化·心态·人格——认识胡适》，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三、《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胡适》，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四、《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五、《胡适：灵与肉之间》，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台湾新潮社 1996 年出版。六、《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

灵与肉的紧张、冲突，于是再现一个大写的“人”字。

相对于文化的连绵性和稳定性，政治斗争的阶段性和功利性是如此的显明。20世纪末回眸看胡适，“西化”、“现代化”、“充分世界化”的术语对他和他的同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所指，却不贴切。事实上，胡适派文人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区位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的温和性和中介性有时表现为同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步（或疏离），有时表现为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妥协（或对立）。可以说，胡适派文人的文化世界主义同国民党道统上所承继、张扬的文化民族主义始终是矛盾、冲突的，并由此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占据的公共空间的非主流文化同官方政治意义上的主流文化的紧张关系。因此，把握胡适派文人的文化脉络和内在理路，梳理文化流向，首先要进入他们所处的文化区位。然而，对历史的还原和再现，都已非历史本身。这需要有一个学术的寻找、认识、理解过程。

这些年结缘胡适，我走过许多地方，结交了不少朋友。这六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友情的纪念。我珍视这分书里书外的机缘。

借这本札记整理出版，写下这片言。

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横看成岭侧成峰”

- 胡适派文人的结构形态 1
一 序说:命题、观念、模式 1
二 结构形态的外在统摄: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 9
三 结构形态的心理范式:自由主义的信念 23
四 机遇与过程:胡适派文人的会聚、流变 54
五 无地自由:胡适派文人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65

第二章 新人文精神的确立与胡适派文人的形成

- 时代氛围和内在理路 77
一 留学生:开放与群聚 77
二 集团与群分:北京大学的文人脉络 82
三 文人的自觉、独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衰、
转折 85
四 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变革:人的自新与社会批判 94
五 《新青年》:一个文化精英群体演示与发散的载体
..... 101
六 北大学生:结社、群聚与精神取向 111

七	清华学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摇篮	118
八	精神感召:浓得化不开的情结	136
第三章	“新月”下的自由搏击	
一	——细说人权与约法论争	153
二	“革命”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沉默、嘲弄	
		153
三	公开的抗争: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争人权、要法治	
		161
四	社会反响:理解与压制	176
五	冲突升级:反党治、争自由	188
六	胡适退却以后:罗隆基、王造时的联手	195
	《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平社的清华文人群体与胡适的政治介入	215
附录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247
第四章	“独立”、“自由”的失落与困境	
一	——民主与独裁之争	250
二	内忧外患:“救火”、“补天”派自由主义文人顿觉成了“乱世之饭桶”	252
三	民主、宪政:“新月”的余光、回响	257
四	胡适与“清华三教头”: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	
		284
五	胡适与丁文江:新式独裁之争	305
	未尽之语:吐丝与作茧	315
第五章	危机与认同	
一	——战火中的自由之神	322
	胡适复出学界:大批自由主义学人唯胡适马首是	

瞻,在国共军事决战时,他却倒向蒋介石政府	322
二 胡适、储安平、吴景超与《观察》、《世纪评论》:自由 主义文人群起议政,在自审与左右夹击中寻求 归程	335
三 信念操练:胡适派文人的宪政试验,及胡适的议政 时论	364
四 危机中寻求政治认同与自我拯救:胡适派自由主义 文人的分化	377
第六章 从“民主自由中国运动”到“中国民主党”	
——胡适的张力与雷震的努力	380
一 内部变革的尝试:雷震与“民主自由中国运动”的 缘起	381
二 寻求自由的舞台:《自由中国》创刊与蒋廷黻的“中 国自由党”流产	386
三 走向政治对抗之时:“反对党”呼声四起,胡适退避 三舍	392
四 胆小君子爱惜羽毛:“中国民主党”“临产”,胡适持消 极态度	395
五 政治淫威之下:“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 文人群体的散落	401
后记	404

第一章 “横看成岭侧成峰”

——胡适派文人的结构形态

一 序说：命题、观念、模式

1

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学研究中，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配置说成是这样一种人：“尽管作为社会一员他理所当然地扮演了复杂的社会角色，但在他被期待（一个他自己也正式分担的期待）的主要角色资格上，在确定其投身时他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由此，他的首要角色和位置，作为对其行动的有价值的结果的贡献，才是富有意义的。”^①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热情和责任感，又使得“知识群体很自然地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状况，产生一种日益增长的关注感”。这一关注既表现于“责任感”之中，又表现于对“被听取权”与行使“影响”的要求之中。作为社会的独立角色，知识分子的人格、立场决

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阎步克译），《文化：中国与世界》第3辑第356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定了他们“必须处于主要的政治权力占有者与经济资源控制者之外”^①。这种超然的地位又取决于社会—政治的有序，呈现出的是社会的绝对给予。这样，知识分子才可能“一方面是通过对价值献身的坚守，另一方面是通过以个人的、制度的、学科的威信以及其他‘声望资源’来行使影响”^②。没有控制“权力—物质”性的影响手段的知识分子，必须以此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运用被听取权。

实际上，帕森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注居于社会关注之上之说，正是马克斯·韦伯强调的学者生涯中的学术至上。^③从马克斯·韦伯到塔尔科特·帕森斯、爱德华·希尔斯以及后学，他们都试图建构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神话。希尔斯强调知识分子是“受过先进的现代教育”的人，他的“先进”性和“现代”性是他们置身社会的影响力和被听取权。但希尔斯同时指出，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讲，“他常常或者被当局所同化，或者作为反对派来反对当局。他难得可以一边干着他的工作，一边对当局保持中立。和政府的疏远使得反对政府的起义在心理上具备了现实的条件”^④。在 20 世纪动荡复杂的世界政治—社会秩序中，知识分子所宣传的思想往往是重复那些在早期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就已有的东西。在这些思想中“首要的是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些，对于落后的和发展中国家以

① ②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 3 辑第 372 页。

③ 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王容芬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和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姜新浩、孙嘉明、尹荣、王伟新、王春生、刘伯鸣、张同俊、赵琳译）第 3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及殖民地国家尤为见效。知识分子的那种自由主义思想，时常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冲突、矛盾。但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有时也能同社会主义缓和、兼容，原因便是“知识分子对那些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和掠夺弱小国家的国家的仇恨”^①。这是一种超越文化神话的社会正义。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格，表现为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这种批判精神来自他们所代表的神圣传统。余英时认为这个“神圣传统”相当于中国所谓的“道”。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所持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秩序的重建。^②

历史进入了 20 世纪，“士”阶层瓦解，现代知识分子兴起，传统的“道”也自然被消解、被批判。新的“道”统则是科学、民主、自由、秩序。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异常的艰辛和坎坷。他们努力去构筑自己的文化神话，却因现实的无序而不得不投下更多的社会关注，去演示自己的政治神话。政治本身自有“游戏规则”，并且是知识分子所无法认同的。知识分子基本的自由、民主观念时常想实现，却又得不到充分的实现。文化—社会、文化—政治的两难折磨着知识分子。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人争取民主，大多是激于道义，或者为了政治动员，其目标虽然高昂，但社会基础则十分狭窄，力量也因此薄弱而不能持久”^③。

知识分子的“先进性”和“现代性”，奠定了他们作为先觉

①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第 349 页。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 113—11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陈方正：《论中国现代化与文化建设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 年 10 月号。

者、启蒙者而同传统对立的基础，并由此展示出一种启蒙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驱使他们关注社会—政治的行为。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阶层，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最为直接的作用场，便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市民社会”以及由此展开的“公共空间”。希尔斯在审视“传统为什么会变迁”的内部因素时强调：“只要自由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的缺陷，它便能获得拥护。”^①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在有所作为时既不顾中国特殊的国情，也缺乏对自身的现实关注。这样，他们就无法在“市民社会”中植根，更不能作用于广大的农村。因此，这个“拥护”就无从说起，也就无法获得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自由主义思想同社会及官方意志下的主流文化思想对立时，往往会惨遭失败。

这里，我尤其珍视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在为他的《学术人》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所揭示的这样一个合乎世界百年历史的事实（“作为阐释和理解全球知识分子场境中当代法国哲学家的特殊性的主要要素”）：“这一代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异端的哲学家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不得不为的事，也正是这个位置把一代人的集体命运，变成了一个可以作出选择的选择性。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他们学术上的成功则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② 然而，事实却相

①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反，他们成了官方意志的受害者，或被统治者视为异端。致使他们拥有的知识权力和占有的文化资本，同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相比，显得多么的软弱无力！这种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的开发和知识权力的利用，在政治强权和经济实力派的夹击下，冒出的是一种不绝如缕的书生气。

2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① 这是胡适派文人殷海光对自己以及同人的基本界说和自律。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代，由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形成不同的文人群体，他们介入政治，同时又保持“文人”的基本品性，但往往由于思想的一元取向，和文人对权威、政体的依附而出现“内圣外王”，以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人文精神取向。因为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精神的高扬，他们也就无力、无法化解政治和思想的一统。

本世纪 20 年代初，由于“普遍王权”的崩溃，使得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道德秩序瓦解，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士阶层）同官僚阶级的固定关系（依附、入仕、升迁之途）断裂，于是城市新进阶层出现，知识分子的背景复杂化。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已经不再是一体化的阶层，致使知识分子变成了“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写作的有形自由，和形而上的精神

^① 转引自胡伟希：《殷海光的心路历程》，《读书》1989 年第 5 期。

自由)^①。走出传统角色的新知识分子的群体兴起后，便注意向传统绅士阶层争夺文化领导权。他们同社会—政治的“固定模式”变异了，因此也就失去了过去的特定地位和权力。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少在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更多地在公共社会(Civil Society)——不稳定的 政治权力也就可能成为公共社会的不可小视的革新力量。他们在当时特定的思想解放，政局迭荡，各种思潮、各派势力竞相崛起之时，试图导引时代思想的主流，形成了自由、开放、兼容的多元纷呈的局面，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瞬间的辉煌，造就了一代新人，并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随着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明显的政治分野，文人们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出现了相应的变异，很少能保持中立而不偏倚的，甚至形成敌对的趋势(如左派文人与倾向国民党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胡适派文人在某一时刻也具有明显 的政治倾向，即在保持自由主义精神的同时，相应地对现行秩序有所宽容、妥协，对行政权有所依附、期望，向国民党政府倾斜。这一点，主要是由他们的核心人物胡适同执政党的关系所决定的。

3

一个团体的基本参数应当是：“团体组成、团体结构、团体过程、团体规范和价值、奖惩体制。”其中“每一项参数都可以根据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对团体的一般观点而获得完全不同的

^① 薛涌：《政治与文化——邹谠教授谈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一》，《读书》1986年第8期。

意义”。^①作为存在于现代、当代(主要指 1949 年以后至 60 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文人群体,胡适派文人不同于一般的具有广泛影响力、发动力的政党。它是一些思想倾向、文化见解和志趣相同或相近的自由主义文人的近于自觉的群聚,并游弋于政治的边缘。他们有组织名称、核心人物、理论纲领、旗帜、刊物,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公开发表宣言,以显声势,并呈流动的开放式结构。同时因成员组成的复杂而又有别于文学上成分单一的作家的群聚(流派、社团、作家群)。

国家、社会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性和秩序化。任何“有组织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质是,它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是有秩序的”^②。而社会的结构又具体地呈现“有联盟系统和无联盟系统”^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视野看去,胡适派文人作为一个小型的占据舆论公众空间的松散、开放性群体的“群体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共性”。^④这个群体的内聚力,是受群体的“首领和领导”胡适的地位所左右的,即他的“超凡魅力”的统摄。群体的外在形态,取决于“心理共性”作用下的“群体压力”^⑤,即从众性和从众行为。这里指对自由主义信念的自觉遵从和自由体现。

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来,人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中充当的角色,除决策者外,便是参与者、顺从者和无知者。胡适

① 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蒋春雨、唐慕文、李锡勤、于秀贞译)第 155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列尔涅尔:《控制论基础》(刘定一译)第 287 页,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汉肯:《控制论与社会》(黎鸣译)第 51 页,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④ 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第 151 页。

⑤ 同上书,第 219 页。

派文人只是充当了“参与者”，始终未能进入决策者的层次。他们关注的政治是“边缘政治”，即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行走——立身学术，并通过学术去关注、干预政治。因此他们“把需要解释为目的，把目的假设为价值”，从而赋予学术以某种带有功利性的政治一社会意义。胡适派文人不是十分严密的有组织的规范性群体，具有相对的开放特性。尽管这个“群体”事先有“组织”，事成有“秩序”，有一个外在“规范”统摄，尤其是胡适作为中坚人物的人格魅力、思想意识为大部分人所遵奉并接受，从而使群体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师承性，但它又具有相对的开放的发展变化着的流动性、疏散性。

哈贝马斯将学术同政治的关系的表现形态分为决策主义、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三个基本模式。胡适派文人群体属于“实用主义模式”的形态。这一自由主义文人群体在国共两大政党的激烈斗争中，对国民党的政体产生相应的依附。因此，这一文人群体在对政治一社会产生作用时，是仰视现代欧美文明，以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秩序这六个主要参数——文明、进步社会的标志，来对现政府的技术性决策与实用性决策展开理性的争论、监督、批评，使得他们自身的言行在学术与公众舆论之间形成必要的通晓交流，并有助于形成公众的政治意识。即“通过这种方式，实用的问题能够被转换为学术的问题，学术成果又能进一步作为科学信息反馈到具有接受能力的公众中去”，从而使这种实用主义的模式成为“满足主张以刺激政体改善的方式去联系知识、技术与实践的民主呼声”。^①

① 马克斯·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 116 页。

因此,可以作如下概说:胡适派文人的成员多在国外受过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以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吸引和凝聚作为结构形态的外在范式,以自由主义信念中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秩序这六个参数为内在精神导向,立足文化—学术,并通过言论干预政治。他们倾心于自由的民主政治,主张政治—社会的渐进式改良,并把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作为一种泛文化的理想来追逐,体现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同步趋向,进而影响 1915—1949 年间的现代中国,及 1949 年后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

二 结构形态的外在统摄: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

1

胡适属于“不自由时代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关注并干预政治,但由于未能进入决策阶层,只是个参与者,所以一生未脱书生意气、书生本色,只能在书海行舟时达到消融政治—社会意识的境界,乃至嗜书如命。“政治”作为一种超越人间情怀的力量,“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因此,“谁要从事政治,就必然追求权力,或者追求作为为其他目的(理念的或自私的)服务的手段的权力,或者是为了权力本身,而追求权力:追求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①。这对胡适来说,又不合乎学人的个性。面对许多次参政的机会,他都退避

^① 马克斯·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第 50—51 页。